

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

——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周远全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镇江 212003)

摘要: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美学;福柯;解救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8)02-0035-06

主体是一个和人本身直接关联的范畴。在很多场合下,“主体”几乎被认为是和“人”可以互换的术语。所以,主体问题必然牵扯到人的所有问题,包括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主体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主体不断被修正、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体不断被怀疑、否定和“掏空”的历史。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对现代主体进行了各种各样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法国大哲学家福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福柯之所以要解构主体和主体哲学,是因为他认为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是现代所有问题的根源。福柯认为现代哲学陷入了“人类学沉睡”,这种“人类学沉睡”指的正是现代哲学陷入了主体迷信,从而成为了主体哲学。现代主体哲学反对“神本”,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体,并通过对主体的拔高以赋予人越来越高的位置。而主体哲学就是对人这种拔高的思想产物。虽然现代主体哲学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绝对拔高的另一面,是陷入了主体迷信或人的迷信,人类失去了从人之外的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局限于一种片面的、人或主体的眼光来把握世界,从而失去了对存在、无限和真理的真实的、全面的把握。随着历史的变迁,主体的这种狂妄态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所以,可以断言主体导致了人狂妄地被奴役着的荒谬处境。

福柯的工作可以总结为对主体和主体哲学的解构。“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1]271-272} 也就是说,他

要揭示主体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

一、“人”——沙地上的脸

尼采问“谁在说话”? 他在其语言的内在性中杀死了上帝,也杀死了人,于是超人降临,那么尼采说的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福柯要杀死人,首先必须完成对人起源的探询工作,他是通过考古学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词与物》中他断言,古典知识体系的崩溃,是以表象系统的瓦解为主要标志和途径的,而话语的消解即语言与表象脱离开来则是这个过程的最后的、也是关键的一步,古典认识型下的知识即使涉及到人,也是将之归入秩序的图表中,人因此而被淹没在话语构建的知识中。“在古典思想中,我们从未能在图表中发现这样的人,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象自身,把自己确认为意象或反映,他把图表中之表象的所有相互交织的线条系在一起。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2]402}

只有在语言和表象系统完全脱离后,同时作为知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人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在19世纪的现代思想中,盛行于18世纪的表征消失了,词和语言不再从事表征工作,世界不再以符号的秩序表征出来,人接管了呼号表征的任务,他成为世界的认知者、理解者、揭露者。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的主体,既是学科捕捉的对象,又是学科得以奠定的基础,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正是以人秘密为基础来展开它的学科构想的,人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它的事实,它的秘密,它的真理出现在现在思想中,由此人的科学出现了,而这正是知识序列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也就是说人是19世纪现代知识型

收稿日期: 2007-09-25

作者简介: 周远全(1974—),男,讲师,研究方向为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伦理学。E-mail: zyuquan761111@163.com

的产物。

具体的说,福柯从考古学的角度这样宣告了人的诞生和消失,首先,知识的实证性预告了人的限度,人受劳动、生命、语言的限制,它的具体存在的确定性只有它们中才能被发现,人是有限的,身体的空间是有限的,欲望的豁口是有限的,语言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人被身体、欲望、语言所界定和指明,“然而还有其他更典型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限制不表现为从外部强加于人的论断(因为它有一个本质或一段历史)而表现为这样一个基本的限度,他不仅仅依据自身的存在事实”,^{[3]315}因此,在福柯的考古学层面上,现代人只有作为一种限度构型才是可能的。

可以看出,19世纪后的现代思想创造了或构建了人的存在方式,人不仅确定其他确实性,而且还是自身的确实性的基础,这样,人就诞生了,不过在这个诞生过程中,随着人一起来的,不仅有确实性基础这个使得自己诞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且,不可避免的开了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人必然成为经验物即认识对象,毫无疑问,后者与前者是对孪生兄弟,只不过在人的诞生中隐藏在幕后起作用罢了,在福柯看来,在人诞生之后,使得人最终消失的,却也是这个起初并不引人注意的因素。“人的出现是知识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轻易地表明,人只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一发明或许行将终结。”^{[3]386-387}

那么现代人又是怎样消逝的呢?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呢?首先看人文学科,现代认识型领域是在一个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三个相互交叉方向敞开的区域,人文科学与这三种知识形式的关联,就在于它是存在于这三种知识的夹缝中的,这必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是指人文科学对其他知识形式而言构成了一种永久的危险,即由于人文科学的不稳定,导致了三种科学的不纯洁,“人文科学向所有其他的知识呈现了一种永久的危险”^{[2]454},因此,“演绎科学,经验科学,哲学反思都不会冒险转入人文科学,都不会冒险充塞着人文科学的不纯洁。”^{[2]454}都不会进入人类主义危险。但是,有时候确立起那些中介的层面会遇到种种困难;二是指人文科学本身陷入危险之中,因为福柯认为当人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时,就注定了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是根本不稳定的。因为人文科学是知识空间之危险的中介,“这个处境注定人文科学具有一种基本的不稳定”^{[2]454}

其次,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的产生,是人消逝的关键,无论是人种学还是精神分析,都严重冲击了人文

科学的边界,与人文科学相比照,精神分析和人种学更是反科学,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不比其他科学合理和客观,而是意味着它们是其他科学的逆流,把它们归于它们认识论的土壤,并不停的拆解那个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实证性的人,福柯说“所有人文科学只有通过不理睬无意识,期望着无意识的——它并不是指向在对不言者进行阐明时逐渐应该加以说明的一切,而是指向这样一个东西,即这个东西在那里并躲藏着什么,凭着事物的、自我封闭的文本的或者可以可见文本中的空白处之寂静的稳固性而存在着,并藉此而进行自卫”^{[2]488}。人文科学本来是通过实证性的领域寻找人的认识体系或认识条件,但现在这种认识体系或条件不再是通过认识论三面体而构建了,而是要脱离人已为自己确定的界限,直接在无意识领域中寻找实证性的基础,这样,由以建立起的人的基础性条件,人的限定性就受到了严重的动摇,人的限定性在无意识和历史性面前显得模糊而不确定了,而不确定的限定性是无法确定人之为人的,因此,精神分析和人种学消解了人。

除此以外,最终使得人消失的,是第三门学科,即语言学。因为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和人类学一样都不谈论人本身。语言学本来是人文科学得以产生的实证性基础,然而当语言学覆盖人种学纬度和精神分析的纬度时,语言学这个基础性的框架就毫无疑问的被冲垮了,语言学不再是从实证性中得到的稳定的形式模式了,而是随着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具有了无意识和历史性的形式,而是这种形式是无法被整合进建基于实证性内容基础之上的人的限定性框架内的。语言学似乎在浏览、激活和扰乱人文科学的整个构建的领域,并且它既在实证性方面,又在限定性方面来超越人文科学的领域,以前语言总是被用来当作探寻其它存在者的存在问题的工具,而现在由于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因此自己的存在问题也成了问题,这样,源于实证性的人,由人的限定性所确定的人就悄然瓦解了,人消失了。

人之诞生的一个根本性的条件就是大写的话语的消失也即语言由于脱离了表象系统而客观化,消散化,而现在语言又被聚合起来,人的界限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了,因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人也被怀疑并被认定占据了古典时期大写话语的位置,这样,人之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福柯说的,“假如那些排列会像出现时那样消失,假如通过某个我们只能预感其可能性却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那些排列翻倒了,就像18世纪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那么,人们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506}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此谈论的人是概念的人,或者说是人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人的消失,是作为某种观念形态或者知识形态的人的消失,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科消失,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消失,最终是19世纪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

二、“生产”——现代人的本相

哪怕“人”已经死了,福柯还是在研究有关于“人”的命题,他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是怎样的。确实,福柯给我们留下的与其说是一个宣言式的结论,还不如说他开启了又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我们是谁?”其实福柯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需要一条路去走。而谱系学是他走下去的工具。福柯对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考古学改造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理论目标,因为在考古学中非话语实践及其与话语实践的关系的分析始终处于一个很次要的位置。因此,就必须要对考古学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使其研究的重心转到实践的方面来。系谱学的权力分析方法就解决了转向实践研究的问题。

“权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乐于探讨的焦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事关人们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在福柯看来,传统对权力的界定是将权力看成是一个主体(群)对另一个主体(群)的控制、压制或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抑阶级,压抑个人”。^[16]权力难道仅仅是压制性和否定性的吗?福柯的反对立场是鲜明的。他说,“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17]所以他认为“压制”概念完全不能用来说明权力所恰恰包含的生产性因素。人们用压制来说明权力效能,但这是一种纯法律的权力观。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福柯认为这种权力观完全是消极的、狭隘的,而且太过简单。为此,福柯从后现代主义的反总体化、反中心化、多主体性或反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另辟蹊径,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

当然,福柯研究权力还是为了说明主体问题,按照他的话说就是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福柯指的是,无论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因而权力都始终在场,这种关系是流动的,可逆的和不稳定的,主体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人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并成了另一个人的物品,成了另一个人能在其上施加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暴力的对象,那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因此,为了实施一种权力关系,双方至少必须始终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自由,如果整个社会领域都存在权力关系,那时因为到处都存在着自由,如果承认自由是权力关系存在的必要前提,那就意味着在权力关系中必然存在着抵抗的可能性,因此,这种现代性的权力学既不是通过法律来思考权力,也不是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而是通过多样性的无中心主体的力量关系来分析权力。福柯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别和矛盾。”^[16]“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寻求异的权力学说,它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复杂的策略性的处境的名称”^[17]。或者说权力就是一种策略游戏。

梳理了两种权力的区别之后,福柯的目标更为明确,“首先我想说一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的工作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既不是分析权力现象,也不是详述这种分析的基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18]福柯指出,他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在我们文化中把人变成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即在现代文化中作为个体的人、本真的人是如何被塑造成主体的。他说出现代人的本相,即现代人是知识—权力对人的彻底奴役的产物。

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福柯认为“现代人”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现代人”实践,是“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文化人是主体,这只是哲学的主体,哲学主体这个观念包含着以人性为基础的一整套对人的理解。但是,本真的人、原初的人并不是主体,并不按照以主体为基础的人性观念来行动。所以,西方文化就需要对本真的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主体标准的人即现代人,同时对不符合主体标准的、“不可改造的人”进行排斥,将其归入“非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主体变成人”的过程就是“生产”现代人的过程。福柯认为实际上是知识—权力一起建构了现代人,换言之,现代人是知识—权力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权力形式作用于直接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使得个体归于某类,标示其个性,使他与其个性连接在一起,将一种他必须承认而且别人必须承认他身上存在的真理法则强

加于他。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福柯进一步说,“个人是权力的一种结果,而同时,在它是权力的结果的意义上,有这样的传递作用: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9]

但是,知识一权力对人按照主体标准进行现代人改造是对人的一种彻底的奴役。之所以这么说,是在于知识一权力的改造走向了一个齐一化的极端形式。福柯用知识一权力分析来揭示现代人被彻底奴役的真相的目的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自由”、“个性”等观念进行批判。在他看来,现代“人的自由”不过是这个主体或现代人的变形,人道等都是权力的一种策略,它们都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诡计。实际上,动力、自由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原初的意志力,有个性就意味着失去生命的原初。

福柯进一步认为现代人的“生产”过程分为三种形式,即区分、规训和主体化,实际上,这三种方式是改造个体人的三个步骤。首先,要对主体观念进行细分,也就是说对丰富现代人性的具体形象,从而确立一个改造标准,一个个人可以与之进行参照、自我剖析的“标准人”。这也是福柯所说的分离实践,即将人进行分隔,即同自身分隔,也同他人分隔,这种分隔往往借助的是权力,导致了不同的主体,如罪犯与好人,病人和健康者,疯癫与正常人,福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疯癫史进行了研究。通过社会对疯癫态度的变化,由早期疯癫是一种知识,一种智慧的预示它所揭示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地狱的无情真理”,是和理性平等的,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疯癫还是友善的,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理性成为了标准,人们不再与疯癫愉快的交流了。紧闭成了它的归宿,“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9],从此,理性与疯癫的对话完全停止了,两者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其次,要对本真的、个体的人的行为进行训练、约束、改造、奖惩等等,使其行为举止“文化”而远离本真状态。所采用的是归顺技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在检查中的结合。根据福柯的解释,“规训性权力”是指“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它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接过来使用……”^{[10]242},这种规训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出温顺、健康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

人性中,人们应该能够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的厮杀声”^{[10]254}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即在17、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形成了。它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人完全落入了知识一权力的网络中不可自拔。也就是说,规训社会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它淹没了一切。所谓“人性”、“人道”不过是规训技术制造驯服的现代人的冠冕的幌子,其背后是权力的争斗以及知识一权力强大的“场”作用。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使所谓“标准人”的各种规范、观念、行动准则等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从而消弥改造的痕迹,使“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变成一种个体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因而感受不到现代人人性观念或主体对自我的干涉和控制。主体化过程就是这一现代标准内化的过程,它使主体标准最终变成“自我意识”或“自我教育”。正如福柯所言,这种改造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把理性人的观念内化到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去,从而使标准化显现为一种“个体化”或“个性化”,并且使之表现为一种个体自由的、合理的选择。使现代个体把主体化理解成“自我教育”,自觉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资本主义道德所要求的标准现代人。于是,现代个体被知识一权力彻底奴役却浑然不知,甚至沾沾自喜。

三、“生存美学”——人的回归与困惑

反主体化,是福柯的最后的工作,——是“人使自身变为主体的方式,……——人如何学会承认自己是性的主体”^{[10]208}。人使自己变为主体的方式,是指人可以通过一种自我技术来构造和创立自身的主体,无疑是对传统主体化的批判,是一种主动模式。这种新的主体不再是屈从性的,既不屈从于各种现代权力,也不屈从于这种权力施加于他的各种真理法则和统一性,不屈从于国家对个体的强制而巧妙的造型,福柯寄希望于这种新型的选择性主体来反对那种屈从性的被动主体,他将这视为今天哲学的重要斗争任务,他认为或许今日之目标不是去发现我们之“所是”,而是去拒绝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去想象、去构造我们可能之“所是”,从而根除那种政治性的双重束缚,即现代权力结构同时性的个体化和总体化。这样,福柯的结论便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就不是将个人从国家,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与国家相关联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通过拒绝几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的这种个人性形式,我们必须促

发新的主体性形式。”^{[10]216}

福柯这里的主体形式就是伦理主体形式，它同权力造就的主体的被动性完全相反，福柯用希腊人的性来说明自己的问题，认为，希腊人的性进行反思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自我控制的伦理学，生存艺术是自我控制的艺术，道德是自我控制的道德，美学是自我控制的美学，道德、生存艺术、美学、伦理学、的共通性质和内核是自我——控制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方案表述为“我们文化中的人的主体化所遵循的不同模式的历史”，“个人可以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构成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构建成努力寻找某个道理的道德主体，他也要搞清楚的是，主体在把规则应用到自己身上时，是如何能使自己屈从于这些规则，并将意义赋予自己的生存。”^[11]

这种伦理学实际上是福柯未摆脱传统权力的一种态度，如果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果他的支配技术缜密而细腻，如果主体并没有切实可行的针对着重重权力技术的政治抵抗策略，那么一种伦理策略和美学策略是可能的，福柯并不是设想存在着一种与支配权力相反的权力形式，它并不是想一种权力来对抗规训权力，他认为人们不能把性看作是权力之外的某种超然之物，我们在对性说是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在向权力说不。对福柯而言，主体仍然受推论或社会条件的制约，并且仍然应当被看作处于权力关系之中，所不同的是，他现在看到的个体还具有规定它们自身认同、驾驭其躯体和欲望的能力，以及借助于自我技术来发展一种自由的实践能力。显然他的方案是文人化方案，是美学方案，他虽然承认有一种无法逃避的权力技术，个人虽然不足以与之直接交锋，对抗，斗争，不足以摧毁这种权力，但是，个人可以通过他特有的方式，无视这种权力，让这种权力失效，使他的规训和支配功能难以发挥，这种方式就是自我对待自我的美学态度，认为主体可以被权力造就，但主体同样还取决于自我的选择，福柯这样表明了主体的形成过程，“如果想分析西方社会的主体谱系学，那就必须不仅考虑支配技术，而且必须考虑自我技术，可以说，必须考虑这两种关系的互动关系，”^[12]也就是说，权力技术造就的主体形式并不是绝对的，主体的形式同样取决于个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对支配性的权力技术的偏离，它并不一定吻合于这种权力技术的方向和性质。他反复提到哲学生活，自我的本体论批判，其实正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面对“现代人不过是知识—权力彻底奴役的产物”的结论，福柯试图寻找个体解放的出路。不可否认，福柯的方案有它的可取之处，现代生存美学有其积极意义。福柯呼吁改变个体的日常行为方式、道德

实践。现代生存美学是作为对“规范化”的反动、作为对抗知识—权力的形式、作为自由的实践而提出的。现代生存美学将伦理关注的重心从人与他人的关系转到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可以说意义深远。它充分汲取了古代智慧，也适应了当代社会要求宽容、多元的状况。但是，现代生存美学夸大了个体的精神力量，首先，它们最终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被知识—权力奴役的处境。很显然，福柯的现代生存美学把从知识—权力的束缚之下的解脱出来的希望寄托在现代个体的自我改造或精神力量上，以为只要个人创造出一种反对齐一化的资本主义道德的“自我意识组织”即主体化，就能够求得个体的解放了。而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反抗也应该包含着社会制度的改造，把解放的任务完全压在个体的身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放的。同时，现代生存美学对个体精神、审美感受的拔高，存在着忽视超越性、忽视更高的意义的危险。毕竟，个体经验是碎片化的、纯粹经验的，以此为基础的现代生存美学很容易沦为色情的、堕落的虚无主义的游戏。

其次，将现代道德问题的解决归结为纯粹个体的自我意识组织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定了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价值，容易滑入一种保守主义的心态。福柯最有价值的方面是使理论家们注意到了权力运作的无所不在性，并且凸现了理性、知识、主体性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等所具有的成问题的或可疑的方面，它以翔实的分析说明了权力是如何渗透到学校、医院、监狱及社会科学之中，同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交织到一起，福柯展示了权力、真理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描述了自由——人本主义价值是如何同统治技术交织在一起并支持了统治技术。但是，尽管福柯开始走向承认启蒙理性的某些积极方面，但他未能用这种态度去评价现代制度和现代技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过于片面，只注意到了理性化所具有的压迫形式，却未能指出现代性的任何进步方面，他的系谱学对统治的强调基于对抵抗与自我建构的强调，而他对自我建构的分析又脱离了对社会权力与统治的周密思考，从统治技术向自我技术的转变显得非常突然且缺乏中介。他也未能恰当地协调好从统治技术向伦理技术的转向，未能弄清伦理学、美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并没有完成揭示两种类型的自我，“构作性自我和被构成性自我”之间互动关系的任务。所以，福柯没有解决在一个到处都充斥着权力关系的时代中，自我技术如何能行得通，同时，他所关心的是性和自我构建技术，而不是古希腊的民主的自我管理实践，强调驾驭自我对驾驭他人的重要性，但却不讨论经由民主社

会的社会实践进行的自我构建,这种缺漏暴露出对民主的一种典型忽视。

最后,现代生存美学强调绝对的个人创造,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并不是社会中所有个体都有能力认识到自身被知识—权力束缚的境遇,不见得所有人都有能力摆脱传统而实现自由的选择和创造。当代实践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体选择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组织的方式是有关系的。不应该仅仅

强调个体的精神力量,而应将其个体性和社会性结合在一起考虑。社会不变革,仅仅依靠个体精神层面的努力,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现代实践和道德的困境的。只有打破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现代人才有解放的可能。现代人被束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人的解放才可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 [1] 德赖弗斯 L,拉比诺. 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 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1-272.
- [2] 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3]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1994.
- [4]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4-225.
- [5]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
- [6] 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 [7] 福柯. 认知的意志[M]. 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68.
- [8] 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 [9]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53.
- [10] Hubert L. Dreyfus,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1983.
- [11] 福柯. 关心自我(Le Souci de soi)[M]. Gallimard, 1984:53.
- [12] 刘北成. 福柯思想肖像[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99.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Aesthetics Relief ——On the Modern “People” Foucaultian Deconstruction ZHOU Yuan-q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Abstract: Since the age of Descartes, the Juche idea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modern philosophy. Howev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Juche has become notorious and its philosophical paradigm is considered as outdated stereotypes. Traditional controversy of Juche has no more significance, thus, both paradigms of language and the individual priority of self-consciousness can not be properly explained. It seems more practical to find a link between these two paradigms, for example, the Michel Foucault road.

Key words: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esthetics; foucault; relief

[责任编辑:箫姚]